

# 协同发展视角下“一带一路”与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

张立 胡大一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外交理念，“一带一路”是彰显这一理念的重要方案与路径，通过互联互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命运相连。本文旨在借鉴协同发展理论，审视中国与南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并结合相关数据对其实践进展进行测量。本文认为，各国之间是否保持协同发展以及协同发展度的高低，是衡量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体现的核心所在。为此，本文以协同发展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及安全共同体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有关中国—南亚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计量模型，用以衡量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程度。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除中国与阿富汗等个别国家协同共振效应较低以外，中国与南亚地区的整体协同发展效应已开始显现，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协同度和中国—南亚整体的协同发展度趋势基本一致，并且中巴两国的协同发展程度领跑南亚各国。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相连。在新冠疫情等突发冲击难以避免、中国与南亚各国经济社会都还欠发达的状况下，各国应当继续着力推进互联互通，深化互利合作，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减少不必要的内耗，营造协同共进的政策氛围与发展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 南亚 命运共同体 协同度

**【作者简介】**张立，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国际政治博士，从事印度和南亚地区研究，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中印关系、全球经济治理；胡大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印度和南亚，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关系。

## 一、引言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东盟时分别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二者多次在重大场合被中国领导人广泛提及，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上升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新重点。<sup>①</sup>与这一宏伟倡议完美契合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新时代外交理念。这一

---

<sup>①</sup>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大创新》，新华网，2016年9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7/c\\_12927213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7/c_129272136.htm)。

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扬,<sup>①</sup>已成为指引中国外交的根本性价值遵循。在国际层面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获得重要国际组织和多个国家的认同支持。<sup>②</sup>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新冠疫情(COVID-19)的到来和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涌动等,加剧了世界的复杂性,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各国和平相处、守望相助,<sup>③</sup>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sup>④</sup>因此,可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运用于周边关系上,以此入手,让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周边开花结果,以此对推动建设更加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起到良好示范效应。<sup>⑤</sup>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重要一环,<sup>⑥</sup>中国与南亚国家一衣带水、山水相连,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有着诸多的项目合作,因而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构建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周边外交关系,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现实需要与战略选择。

尽管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已经频繁见诸媒体期刊,但如何从实践的层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现有其它类似国际关系模式的区别何在,“一带一路”倡议问世以来,中国与包括南亚国家在内的其他各国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取得了何种成效且当如何测量,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尚待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解答。<sup>⑦</sup>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需要被理解,也需要将新出现的外交概念进行理论化学术化解析,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地区和世界。为此,本文尝试借鉴协同发展理论,将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官方话语转化为可量化测度的学术概念,并借鉴“一带一路”联通程度和协同发展模型等,对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程度进行度量,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更直观地理解“一带一路”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本文将首先对现有理论进行回顾,在指出现有理论不足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发展理论,提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新阐释新理解,在此基础上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和南亚离实现“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距离有多远。本文构建的模型未来也可扩展到中国与其它地区与国家的相关研究上。

## 二、 理论回顾

命运共同体概念源自于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理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目的共同体,其承载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共识,本身就

---

①李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承与创新: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2期,第42页。

②徐祥丽、李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人民网,2019年10月11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11/c429373-31394646.html>。

③杨鲁慧:《百年变局与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东岳论丛》,2021年第6期,第95页。

④《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⑤卢光盛、别梦婕:《新型周边关系构建:内涵、理论与路径》,《国际观察》,2019年第6期,第23页。

⑥《习近平出访南亚:将构建利益共同体》,人民网,2014年9月17日, <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0917/c1057-25680469.html>。

⑦目前仅有关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程度的度量。详见: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数据分析平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程度进行度量, <https://ydy1.pku.edu.cn/>。

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sup>①</sup>具体看，这里的共同体是指与拥有相同身份、特质、本能、职业、地域、习惯和记忆的人群相关，是人与人结合而成的“现实的有机的生命”。<sup>②</sup>其共同性表现在，不同国家或不同人类之间在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利益、目标等方面所具有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一致性”特质。相同的价值观，以及同等重要的共同利益，将这些群体间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团体。历史地看，人类共同体正由早先的血缘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发展到后来的超国家共同体。欧盟、东盟等是超国家共同体的典型代表，作为区域共同体的两个典型案例，欧盟和东盟的成立也被学者们进行广泛研究，学术界对于这两大区域共同体的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两大流派。

### （一） 新功能主义理论

超国家机构的存在是新功能主义视角下共同体的第一个特征。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是最早运用新功能主义理论来研究欧洲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的学者。<sup>③</sup>共同体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政府间制度，旨在通过政策协商来协调管理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政府间谈判和国际制度为这种协商提供了环境和路径，同时，在协商过程中，国家行为受到国内社会压力和国际环境的双层影响，因而可以把国家作为共同体研究的逻辑起点。<sup>④</sup>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间合作和超国家实体的二分法，新功能主义基于国家行为将共同体看作超国家实体。<sup>⑤</sup>国家将政治或经济的决策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实体机构，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间的汇集和融合。<sup>⑥</sup>这意味区域共同体的实质是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部分主权让渡，将权力移交给超国家机构，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措施来保障这个实体的运行，例如欧盟就是一个高制度化的超国家机构。<sup>⑦</sup>

“功能”与“溢出”是共同体的第二个特征。新功能主义认为管理“需求外溢”导致了“功能外溢”，外溢效应为一体化提供了根本动力。<sup>⑧</sup>这种溢出是自动的、可预测的，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中的溢出是内生需求而非来源于外部刺激，这是一种变化的理论。<sup>⑨</sup>从国家间的合作向成立超国家机构这一渐变的过程中，进一步触发了国家间加深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内生需求，每一种加深都是利益集团、国内舆论、政治精英或其他国内行为者压力传导的过程，因而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功能溢出（或经济溢出）和政治溢出两个层面。<sup>⑩</sup>溢出效应指的是一个领域的整合最终会导致其他功能相关领域的整合，<sup>11</sup>在一体化过程中，国家的现有政策难以和超国家机构的政策达成步调一致，此时就会出现功能性溢出，对政策进行深化以实现政策协调。功能性溢出往往是经济

---

①周安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探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28页。

②陈曙光：《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何谓与何为》，《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68页。

③Soren Dosenrode, "Federalism Theory and Neo-Functionalism: Elements fo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erspectives on Federalism*, vol.2, No.3, 2010, p.4.

④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1, No.4, 1993, pp.473-524.

⑤Ian Manners, "European Communion: Political Theory of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3, Vol.20, No.4, pp.473-494.

⑥Linda Quayle, "National and Regional Obligations, the Metaphor of Two-Level Games, and the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5, No.4, 2013, pp.499-521.

⑦Taku Yukawa, "European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ASEAN: Rethinking Eurocentrism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21, No.4, 2018, p.327.

⑧姜南：《浅析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87页。

⑨Andrew Moravcsik,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Compromise and the Neofunctionalist Lega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2, No.2, 2005, p.353.

⑩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pp.473-524.

11Min-hyung Kim, "Integration Theory and ASEAN Integration," *Pacific Focus*, Vol.29, No.3, 2014, p.379.

性的，它反映了区域内国家经济紧密相连的本质，政府对一个部门的干预会溢出到其他部门，从而实现政策上的失衡，一体化的过程必然会导致各部门之间的经济或者功能不断外溢，唯有加强政策之间的联系，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超国家机构以处理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sup>①</sup>例如，对于欧盟而言，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导致了经济溢出，这种经济溢出又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溢出，而政治溢出的本质又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

## （二）政府间主义

政府间主义是理解区域一体化的另一大理论，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者，他认为相较于新功能主义，应该在全球视野下理解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强调民族国家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力量与作用。<sup>②</sup>政府间主义认为区域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形成存在三个阶段：一是国家偏好的形成，二是国际谈判，三是建立区域机构。

首先，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外生的经济利益，以及国家谈判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偏好，从而进入区域共同体建设的第一阶段。<sup>③</sup>国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基于特定领域的利益偏好所决定的，例如欧盟国家间的特定偏好经历了特定经济议题、安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转变。<sup>④</sup>

其次，在一体化进程中，国家间的实力往往是不对称的，虽然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存在部分领域主权让渡，但国家为了避免自身的薄弱部门免受国际市场的压力，会进行国际谈判，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sup>⑤</sup>各国议价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国际环境中能多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偏好。现实政府间主义区分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国家更愿意参与到“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而抵制“高级政治”领域的融入，因为“低级政治”领域主要以经济合作的形式开展，不包含国家的核心权力，而“高级政治”领域则涵盖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权力，并且一体化的意愿在大国和小国之间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讲，弱小国家更加希望加入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则更愿意“低级政治”一体化，“高级政治”独立主权。<sup>⑥</sup>国家谈判的完成意味着区域共同体建设第二阶段的完成。

最后，政府间主义将国家视为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重要联系者，是推动或者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主要代理人。<sup>⑦</sup>当国家代理人完成谈判并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后，区域共同体建设进入第三阶段。从制度理论的视角看，国际制度有助于各国达成一致，减少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通过彼此间的谈判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各国对彼此利益偏好的不确定性。<sup>⑧</sup>各国按照预先制定的谈判规则形成一系列的制度机制，基于不同偏好和议题的谈判会形成不同的制度机制，通过特定制度的构建为区域共同体的成立保驾护航。<sup>⑨</sup>

---

①Ibid.

②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95, No.3, 1966, pp.862-915.

③Finn Laurse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2008, p.7.

④Andrew Moravcsik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2020, p5.

⑤Andrew Moravcsik,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Compromise and the Neofunctionalist Legacy," p.356.

⑥Frank Schimmelfennig,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2018, p.14.

⑦Thomas Risse-Kapp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4, No.1, 1996, P.56.

⑧Andrew Moravcsik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p8.

⑨Barbara Koremeno et al.,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4, 2001, pp.761-799.

### （三） 以上两大理论的局限

从创建背景来看，要将已有理论用于解释命运共同体必须基于相似的环境和时代背景，而现有国际经验与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和时代环境存在显著差别，这就造成了现有理论的不适用，难以在同一理论视角下理解不同背景的共同体建设。欧洲一体化的初始动力是源于战后百废待兴，成立经济联盟以发展经济建设是欧洲的首要目标。<sup>①</sup>欧洲一体化建设经历了从欧洲共同体向欧盟的转变，但在美苏冷战期间，受制于冷战的历史环境，最初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在经济领域展开缓慢合作。随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时期，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欧洲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也标志着欧盟的成立。<sup>②</sup>无独有偶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是在冷战时期成立的国家联盟，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打击，以及面对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安全变化后，东盟国家认识到了自身联盟的脆弱性，并提出了建设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设想”。<sup>③</sup>因此，从创建背景来看，欧盟和东盟都创建于战后美苏冷战期间，且冷战的结束都在一定程度催化了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则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转换的窗口期，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招致了中美摩擦不断和对抗性加大，在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依然有着相当市场的国际秩序里，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思想，则是为了超越现实主义政治思维必然导致的历史悲剧，摒弃国家间零和对抗的冷战思维，与各国实现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从创建形式上看，既有理论难以解释非联盟背景下的人类共同体构建。从形式上看，欧盟和东盟都是具有相似的政治体制的国家以联盟形式形成的区域共同体，例如，欧盟国家大多为民主国家的联盟，而东盟大多数国家为非西方式民主国家。<sup>④</sup>又如政府间主义所强调的，欧盟和东盟成员之间存在制度约束，通过制度、法律和联盟关系将彼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这两种模式未必能适用于文化更加异质、需求更加多样化的地区范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以人类整体命运为本，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足以容纳一切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站在关注所有人的本质与发展这一人类命运的哲学高度寻求各国间的基本公约数，因而这一思想也超越了既有理论的相关条件限制。

从创建内涵角度，命运共同体不具备原有理论视角下的超国家机构特征，也并非仅考虑国家和少数精英集团的利益。新功能主义视角下区域共同体的整合和扩大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即横向一体化（功能溢出）和纵向一体化（超国家机构），但这一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戴高乐总统的空椅子危机对这一理论构成了挑战。<sup>⑤</sup>超国家机构的形成有两个特征，一是发生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联盟，二是存在国家间的主权让渡。中国作为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发起者，遵循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不干涉别国内政，因而不可能允许牺牲国家主权的情形发生。从共同体建设的参与主体来看，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sup>⑥</sup>因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享有权益，每个主体都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而非囿于强调国家或者政治精英的作用。

以上分析从创建背景、创建形式和创建内涵三个方面辨析了命运共同体概念与既有理论和国际实践的不同，因而需要考虑从新的视角来诠释理解当代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

①关信平：《欧洲联盟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兼析欧盟社会政策的目标、性质与原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二期，第79页。

②卞庆祖：《扩大的欧洲联盟》，《和平与发展》，2004年第2期，第48页。

③方长平、郑凌：《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14页。

④Min-hyung Kim, "Integration Theory and ASEAN Integration," p.380.

⑤Finn Laurse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p.2.

⑥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页。

### 三、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一） 协同效应的内涵

“协同论”和“协同学”最早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在研究量子纠缠的激光理论时提出，他认为在激光器中运动的原子将会产生完全均匀的、几乎无限长的波列，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原子的行为是“自组织”的，激光原子通过“自组织”将无序运动转换为有序运动，这就使激光成为协同学的一个模型。<sup>①</sup>哈肯的“协同论”认为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众多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一个有序环境。<sup>②</sup>协同理论揭示了物理、化学、生物等不同领域的发展过程，尤其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解释了各复杂系统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从无序混乱状态向有序平稳状态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会形成“1+1>2”的协同效应。<sup>③</sup>协同效应及其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区域发展的研究，因而将协同理论用于研究“一带一路”视阈下的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根据协同理论的内涵，可以将世界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各个国家是这个复杂系统下的子系统，国家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行为开展一系列的合作，例如区域多边机制、国际组织、欧盟和东盟等都是区域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变的典型案列。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围更广，不再局限于相邻地理位置的国家合作，作为一个全球性倡议，其目的是为了使各国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通过协同达成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从而构建有序平稳的国际与地区秩序。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与南亚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中国与南亚的每一个国家行为体组成了八个系统，因而每个系统之间也存在协同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南亚国家协同发展是基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提升地区发展的整体福利，扩大整体利益。经济增长是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区域内的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5年至2016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GDP增长做出的贡献占全球总贡献的三分之一，这一数据超过了同期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贡献之和。<sup>④</sup>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溢出效益，其他国家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对于南亚国家尤为如此，同时，有学者发现，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双向溢出效应，南亚国家在经济取得进步后会反哺中国经济，<sup>⑤</sup>从而提升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发展可以为“南南合作”树立良好的示范效应，在亚太地区构建平等有序的合作关系，并有助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实力，缩小“南北差距”，从而提升南方国家在“南北合作”中的话语权。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来看，全球

---

①[德]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

②陈丹宇：《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为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页。

③“1+1>2”的协同效应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通过协同发展会形成一个复杂系统，该复杂系统产生的整体效应大于单个子系统所产生的效应之和。参见王红等：《循环经济协同效应：背景、内涵及作用机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第142页。

④Dieppe et al.,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to Sustainable Growth—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Euro Area,” ECB Occasional Paper, No.206, 2018, p.37.

⑤Banga and Rashmi, “Has South Asia Benefited from the Growth of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6, No.3, 2014, pp.205-232.

南方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较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国际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位置,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较小,而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话语权。<sup>①</sup>因此在“南北合作”中,南方国家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南方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整体实力的提升,以此来改变全球北方国家长期以来所主导的国际秩序,<sup>②</sup>从而推动“南北合作”回归到均衡状态。

第三,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是区域内大国协同合作、大国和小国协同发展所形成的均衡极化状态。如前所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大国和强国,然而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却一直由美国这一域外国家所主导,这体现了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在构建地区秩序的作用上存在明显失衡。<sup>③</sup>例如,在奥巴马时期,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旨在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多变秩序,虽然后来特朗普采取奉行双边主义、孤立主义,主动退出了 TPP,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仍然存在。<sup>④</sup>多边制度是构建亚洲秩序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中国在新时代提出来的多边合作机制,<sup>⑤</sup>作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可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印度等南亚国家一道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同时,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印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作为区域内的两极,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此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扩散和溢出效应,实现亚洲区域发展的均衡与极化。

第四,中国与南亚国家协同合作可以提升地区整体抵抗风险的能力。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抵消内部安全风险。任何一个国家身边出现了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都会使该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各国的安全度呈现零和关系,中国与南亚国家加深协同合作可以使中国成为地区安全 and 经济公共品的提供者,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方针,唯有如此方能规避国家陷入安全竞赛,从而有效降低各方面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sup>⑥</sup>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地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非传统安全立足于环境、能源、气候等低级政治领域,新冠疫情即为眼下最为棘手的非传统安全。<sup>⑦</sup>虽然中国在抗击疫情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若南亚国家不与中国同心合力协同抗疫,各自为战,亚洲经济的复苏将困难重重,世界经济的重新开放也将遥遥无期。因此,只有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合作,南亚国家才能分享中国的抗疫成果,从而提升地区应对疫情的能力。

## (二) 中国与南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协同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产生协同效应的本质在于,基于各国的发展需求,由区域内大国牵头,集合区域内各国协同合作,形成多点式协同发展的均衡极化状态,将原有的无序状态变为有序,抑或是将原有的由域外国家主导的“他组织”模式下的地区秩序,转换为由域内国家建构的“自组织”模式下的国际与地区秩序。

---

①Frank T. Fitzgerald,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11, No.1, 1981, pp.5-18; 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Wilkin, “Still Wait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e Third World’ on the Periphe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 No.2, 2004, p.243.

②Kevin Gray and Barry K. 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4, p.557.

③Xiangyang Li, “The ‘Absence’ of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40, No.1, 2019, p.135.

④Ibid.

⑤Kai He, “Role Conceptions, Order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2, No.2, 2018, p.92.

⑥张立:《“印太”战略的决定因素、发展趋向及中国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1期,第7页。

⑦范佳睿:《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第120~153页。

从而实现地区发展水平和抗风险能力的整体提升，以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因此，建构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协同合作是路径，区域发展、地区秩序和风险应对是内涵所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命运共同体协同效应和内涵价值的具体方式何在？当今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相互依赖形态，各国之间的多渠道联系是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特征之一。<sup>①</sup>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往来提供了理论证明，但由于各国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只有实现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才能抵消非对称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内涵也应该是基于多个维度的协同发展。基于对中国和南亚国家协同发展路径的思考，作者认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存在以下四个维度的内容，四个子系统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复合系统。

第一个维度是经济上的相互协同，构建中国与南亚经济共同体。全球化是由各国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国际机制的变迁，这种在经济相互依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能够担负关键性的利益协调，从而有利于互惠合作。<sup>②</sup>南亚次大陆是中国地缘经济博弈的关键领域，在时空邻里环境下，相邻国家的产业变动也会带动本国产业的变动，<sup>③</sup>这进一步凸显了国家间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尽管南亚国家在 1985 年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以寻求推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但由于存在一系列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sup>④</sup>并且南亚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缺乏一个实力雄厚、且有领导意愿的经济体引领发展，南盟内部的协作仍然见效甚微。“一带一路”为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协同提供良好的契机，并且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推动国际合作的内生需求，中国与南亚国家协同构建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双向溢出，是基于发展的需要。

第二个维度是深化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加强政策沟通，建构政治共同体。政治和经济是国际合作的一对孪生要素，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深，国家通过政治或制度手段保护本国经济的意愿就越强烈，<sup>⑤</sup>如此就会陷入国际博弈的囚徒困境。并且国际政策具有外部性，即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参考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随后该国产生的政策效应又逆反馈给其他国家，这种反馈过程可能产生正向效应也可能产生负向效应。<sup>⑥</sup>因此，要想实现政策的正向效应和避免国家对经济的过度保护，需要各国加强政治沟通和政策协调，并且政治协同的益处不光体现在助力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还有利于安全、文化等多领域的协同。与政府间主义所不同的是，协同并非融合，“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多国政府共同响应，自上而下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因而政治共同体并不要求弱小国家的主权让渡。中国与南亚国家构建政治共同体可以减轻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以促进合作，例如，由于历史、

---

①[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3 页。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37 页。

③杨文武、黎思琦：《基于时空邻里效应的南亚地缘经济产业格局演化及趋势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21 年第 2 期，第 97-117 页。

④Don McLain Gill, “Challeng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An Over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1, 2020, p.42.

⑤Min-hyung Kim, “Theorizing ASEAN Integr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35, No.3, 2011, p.416.

⑥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pp.485-486.



战略和文化等因素,导致中印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sup>①</sup>需要推进两国的政治协商加以调和,同时,政治共同体也为中国和南亚在各领域的协同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个维度是加强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增强地区认同感,构建身份共同体。协同效应的形成需要各国家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合作来源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因而国家合作和社会协同的前提来源于认同。在命运共同体思想看来,成员间彼此认同,拥有相似的价值观或意图,是共同体的首要特征,事实上也是促成共同体形成的必由之路。从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欧盟共同体的发展实践看,没有国家间的认同,那么,这些超国家组织就难以持续运行下去,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将远比实际表现出来的更为险恶。虽然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不在于组建一个超国家机构,但要想实现各个国家在各领域的协同发展需要各国在认知上达成一致。文化是影响国家认知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上的异同会影响国家间的沟通与认知。<sup>②</sup>南亚各国不光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在文化上也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社会传统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sup>③</sup>中国作为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通过“一带一路”加深与南亚地区的文化联系,加推进中华文明向南亚传播,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文化认同,实现民心相通;另一方面,文化认同也会对重塑地区政治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sup>④</sup>是管控分歧和治理冲突的关键。因而身份共同体是地区全面协同发展的根基,如果缺乏社会和文化上的认同,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也将停留在经济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

第四个维度是加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建构安全共同体。政治关系是安全的基础,<sup>⑤</sup>政治协同也是安全协同的基础。实现安全协同的路径在于构建安全共同体。内部安全是安全共同体的特征之一,<sup>⑥</sup>国际政治由具有实践行动能力的主体建构而成,这些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以造就出多样化的行动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也可以培育出安全共同体。<sup>⑦</sup>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真正相互保证不再以战争而是以其他某些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战争将会自动消失,<sup>⑧</sup>因而安全共同体的作用之一在于可以有效缓解区域内的安全困境。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前景并非如同现实主义所分析的那样黯淡,各国完全有可能摆脱相互提防、相互冲突的困境,进入互利共赢的共生状态。同时,安全共同体的作用还体现在协同区域内国家的整体力量以防范来自区域外的安全风险,亦或是共同抵御诸如新冠疫情、水资源短缺等的全球风险。

上述四个子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路径,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非一日之功,国家间协同发展程度的提升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图 1 剖析了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路径演变,作者认为区域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一带一

---

①Khanindra Ch. Das, “The Making of One Belt, One Road and Dilemmas in South Asia,”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139.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7页。

③Mohd Aminul Karim, “South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No.2, 2014, pp.302-304.

④王学人:《中国与南亚人文交流合作——基于经济视角的分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6期,第91-108页。

⑤Emanuel Adler,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Vol.5, No.2, pp.106-109.

⑥Jun Yan Chang, “Essen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Explaining AS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6, No.3, 2016, pp.335-369.

⑦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32-37页。

⑧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6.

路”的互联互通战略为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物质条件，区域共同体基于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两条路径，最终复合交汇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天下大同。<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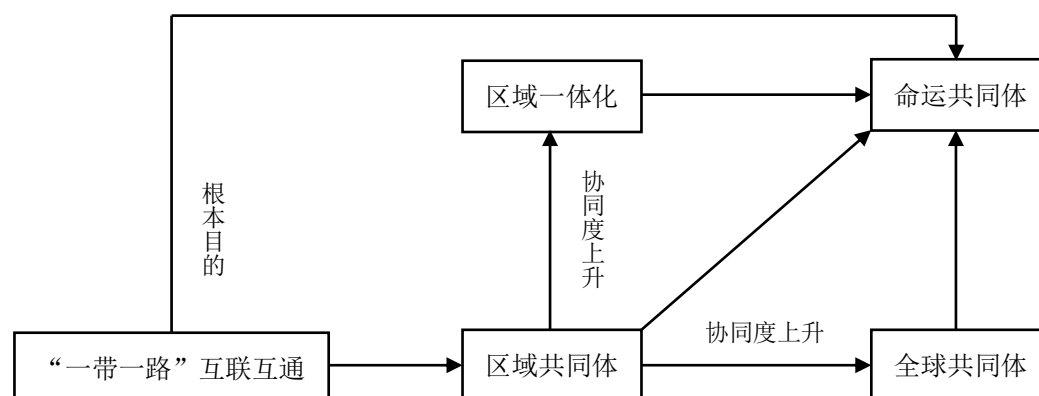


图1 命运共同体协同演变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横向发展的进程看，命运共同体是由国家主导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多维的理念，这一特点符合区域主义理论的假设。<sup>②</sup>从实践上看，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先后在各大场合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理念。<sup>③</sup>因而，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我们可以得知命运共同体可从区域共同体起步，当国家之间的协同程度逐渐上升后，这种基于不同地区建构而来的区域共同体便会逐渐演化形成一股合力，最终建构成为全球性的命运共同体。

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区域共同体只是区域内各国协同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的协同程度是最低的，因为各国可能最初仅存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例如构建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市场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共同体。<sup>④</sup>但“一带一路”路径下的命运共同体涵盖的范围和目标广泛，随着各国协同程度的上升和在各领域合作的拓宽，区域共同体可能最终会向区域一体化进程演变，比如形成统一市场、制定共同法律、产生共同认知与身份等，因而从纵向视角来看，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由区域共同体向区域一体化协同程度不断加深的梯度演进。

基于前述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理论，要想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首先可从构建区域共同体发起。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样的，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作为区域共同体，也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子系统。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背景下，政策沟通是实现政治协同的路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实现经济协同的路径，民心相通和设施联通是实现社会和文化协同的路径，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实现安全协同的关键。“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

①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20页。

②Taku Yukawa, “European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ASEAN: Rethinking Eurocentrism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326.

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2013年10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1759117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17591171.htm)；“中拉命运共同体”参见：《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19日；“亚洲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8/c\\_111479450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8/c_1114794507.htm)；“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参见：《李克强：携手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16年3月23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3/c\\_111842151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3/c_1118421512.htm)。

④Xiangyang Li, “The ‘Absence’ of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140.

上促进了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但还需进一步研究通过这一中介变量，各国之间的协同发展达到了何种程度，文章的下一部分将结合协同发展模型对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 四、 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模型构建及测量

##### （一） 模型构建

在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四个角度构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模型。“协同”描述的是在复合系统下的若干子系统如何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所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协同一致，将无序系统演化为有序系统，决定系统演化速率大小的指标称做序参量。根据协同理论的役使原理，“序参量对系统存在正向作用和反向作用，正向作用指的是序参量的值与系统运行呈正相关，反向作用指的是序参量的值与系统运行呈负相关”。<sup>①</sup>本文将基于这一原理，构建中国与南亚各国协同度模型，测量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发展水平。

本文有关中国—南亚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模型构建主要参考了邬彩霞（2021）的研究方法，同时参考了陈丹宇（2020）、郭红兵等（2019）、吴笑等（2015）、王宏起和徐玉莲（2012）的相关论述。<sup>②</sup>基于复合系统的协同发展理论，本文将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定义为一个复合发展系统 $S = (S_1, S_2, S_3, S_4, S_5, S_6, S_7, S_8)$ ，这个复合系统由中国与阿富汗（中阿）发展系统（ $S_1$ ）、中国与不丹（中不）发展系统（ $S_2$ ）、中国与孟加拉国（中孟）发展系统（ $S_3$ ）、中国与印度（中印）发展系统（ $S_4$ ）、中国与马尔代夫（中马）发展系统（ $S_5$ ）、中国与尼泊尔（中尼）发展系统（ $S_6$ ）、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巴）发展系统（ $S_7$ ）、中国与斯里兰卡（中斯）发展系统（ $S_8$ ）等八个系统相互作用结合而成。结合中国与南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协同路径，本文定义每个发展系统由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身份子系统、安全子系统等四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均由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度量，复合系统的指标体系构建见下图2。

设系统的序参量为 $e_{ji} = (e_{j1}, e_{j2}, e_{j3}, \dots, e_{jn})$ ， $j$ 表示不同的系统类别， $n$ 表示影响该系统运行的指标数量，其中， $\alpha_{ji} \leq e_{ji} \leq \beta_{ji}$ 。 $\alpha_{ji}$ 代表序参量的下限，即时间序列中对应的指标的最小值； $\beta_{ji}$ 代表序参量的上限，即时间序列中对应的指标的最大值， $\alpha_{ji}$ 和 $\beta_{ji}$ 的取值范围由系统本身的特性和所计算出的数据结构所决定，<sup>③</sup>其反应的是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对应指标的取值范围。

首先，需要度量序参量的指标有序度。根据役使原理，序参量的有序度反应了系统的有序度。如前所述，序参量对系统存在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的作用，因而指标也存在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的取值与系统有序程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负向指标的取值与系统有序程度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给出指标有序度的相关定义：当 $i \in$

---

①役使原理指的是系统在接近状态转变的临界点时，存在“快变量”和少数“慢变量”，其中，“快变量”由于演变速率太快而对系统施加的影响较小，系统的转变主要受到“慢变量”的支配作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形成了有序的宏观结构。本文有关复合系统的模型建构以及关于序参量和役使原理的描述主要参考邬彩霞：《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第115页。

②邬彩霞：《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第105-115页；陈丹宇：《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为例》，第148-161页；郭红兵等：《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研究——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个比较实证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3-32页；吴笑等：《协同创新的协同度测度研究》，《软科学》，2015年第7期，第45-50页；王宏起、徐玉莲：《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协同度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6期，第129~138页。

③陈丹宇：《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为例》，第149页。

$[1, m]$ 时,  $e_{ji}$  为正向指标, 此时其数值大小与系统有序度的作用方向相同; 当  $i \in [m + 1, n]$ 时,  $e_{ji}$  为负向指标, 此时其数值大小与系统有序度的作用反向相反。设指标有序度为  $\mu_{ji}$ , 计算公式如下:

$$\mu_j(e_{ji}) = \begin{cases} \frac{e_{ji} - \alpha_{ji}}{\beta_{ji} - \alpha_{ji}}, & i \in [1, m] \\ \frac{\beta_{ji} - e_{ji}}{\beta_{ji} - \alpha_{ji}}, & i \in [m + 1, n] \end{cases} \quad (1)$$

公式 (1) 定义了子系统的所有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指标有序度  $\mu_j(e_{ji})$ ,  $\mu_j(e_{ji}) \in [0, 1]$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 当  $\alpha_{ji}$  和  $\beta_{ji}$  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有可能出现取值相同的情况, 为了规避分母为零而导致公式失效, 要根据数据的实际特征来确定  $\alpha_{ji}$  和  $\beta_{ji}$  的取值, 本文对  $\alpha_{ji}$  和  $\beta_{ji}$  的取值分别为 -5 和 5。

其次, 需要根据得到的指标有序度值进一步计算子系统的有序度值。子系统有序度的计算方式有很多, 通常包含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平均法。两种方法都是对指标有序度进行集成或整合后得到子系统的有序度值, 我们采取几何平均法对子系统的指标有序度进行集成, 定义如下:

$$\mu_j(e_j) = \sqrt[n]{\prod_{i=1}^n \mu_j(e_{ji})} \quad (2)$$

由公式 (2) 可知,  $\mu_j(e_j)$  度量了子系统在时间序列上的有序度值, 假设一个子系统中包含  $x$  个指标,  $\mu_j(e_j)$  反映了这  $x$  个指标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集成, 从而刻画出子系统在不同时间维度的有序度值。

最后, 根据子系统的有序度值计算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 (Degree of System synergy, DSS)。系统协同度的计算同样包含线性加权法、几何平均法等多个方法, 为了保持计算的一致性, 我们同样采用几何平均法来度量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 定义如下:

$$DSS = \sigma \sqrt[k]{\prod_{j=1}^k [|\mu_j^1(e_j) - \mu_j^0(e_j)|]} \quad (3)$$

$$\sigma = \frac{\min[\mu_j^1(e_j) - \mu_j^0(e_j)]}{|\min[\mu_j^1(e_j) - \mu_j^0(e_j)]|}, j = (1, 2, \dots, k) \quad (4)$$

公式 (3) 度量了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 DSS, 假设  $t_0$  时刻的子系统有序度为  $\mu_j^0(e_j)$ ,  $t_1$  时刻的子系统有序度为  $\mu_j^1(e_j)$ ,  $\mu_j^1(e_j) - \mu_j^0(e_j)$  描述了从  $t_0$  到  $t_1$  的时间段内子系统有序度的变化程度, 经过几何平均法计算后得出系统的协同度, DSS 的取值越大, 表示系统的整体协同程度越高。由公式 (4) 可知  $\sigma \in [-1, 1]$ ,  $\sigma$  表示子系统有序度的变化, 决定了系统的演进方向, 当且仅当  $\sigma > 0$  时表示经济、政治、身份、安全四个子系统对中印、中巴等系统和中国—南亚复合系统的作用方向为正, 表明整个系统是协同演进的; 反之, 若  $\sigma \leq 0$ , 则表示系统不存在协同效应。

## (二)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内涵以及协同演变路径 (上图 1), 从纵向维度看, 要想实现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 需要依靠经济、政治、身份和安全四个维度的协同; 从横向维度看, 构建区域共同体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前期路径, 因而构建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等次区域级的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先期路径。作者将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视为一个复合系统, 这个复合系统由中印、

中巴等发展系统相互作用而成，中印、中巴等发展系统由经济、政治、身份和安全四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由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表征（见表 1）<sup>①</sup>，共同构成了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这一复合系统（见图 2）。

表 1 中国和南亚国家协同发展系统指标体系

中国和 i 国协同发展系统	子系统	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经济子系统	双边贸易总额 e <sub>11</sub>	百万美元	CEIC 数据库
		中国在对象国承包工程营业额 e <sub>12</sub>	百万美元	CEIC 数据库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 e <sub>13</sub>	百万美元	CEIC 数据库
		对象国外汇储备规模 e <sub>14</sub>	百万美元	CEIC 数据库
		金融监管合作文件数 e <sub>15</sub>	份	证监会、银保监会
		中资银行在对象国的机构数量和对象国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量总和 e <sub>16</sub>	个	中国四大银行官网、银保监会网站
		是否加入亚投行 e <sub>17</sub>	/	亚投行官网
	政治子系统	政治稳定无暴力 e <sub>21</sub>	/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库（WGI）
		政府治理效能 e <sub>22</sub>	/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库（WGI）
		高层重要互访次数 e <sub>23</sub>	次	《中国外交》年鉴
		与中国属于同一国际组织数量 e <sub>24</sub>	个	中国外交部、各国际组织官网
		双边使领馆总数 e <sub>25</sub>	个	中国外交部
		联合国投票一致性 e <sub>26</sub>	/	哈佛大学数据库
		双边签署联合文件及条约数量 e <sub>27</sub>	份	中国外交部
		是否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e <sub>28</sub>	/	中国一带一路网
	身份子系统	语言文字相似度 e <sub>31</sub>	/	
		宗教信仰相似度 e <sub>32</sub>	/	
		地理位置临近程度 e <sub>33</sub>	km	
		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数量 e <sub>34</sub>	个	孔子学院官网
		文化产品贸易总额 e <sub>35</sub>	百万美元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年度入境旅游人数 e <sub>36</sub>	百万人	世界旅游组织
		签证便利度 e <sub>37</sub>	/	中国领事服务网
	安全子系统	地区恐怖主义事件数量 e <sub>41</sub>	件	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SATP）
		军事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e <sub>42</sub>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双边开展战略安全、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次数 e <sub>43</sub>	次	《中国外交》年鉴
		从中国进口武器价值 e <sub>44</sub>	百万 TIV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四大银行指：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银保监会有关“一带一路”国家银行机构数据、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签订的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ndex/guidangshuju.html?or>

<sup>①</sup>如表 1 所述，“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是检验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程度的中介变量，因而在指标的选取上，作者部分参考了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数据分析平台的相关指标，参见 <https://ydyl.pku.edu.cn/>；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有关亚洲一体化研究的部分指标，参见 Cyn-Young Park and Racquel Claveria, “Does Regional Integration Matter for Inclusiv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59, October 2018, p. 9.

iginWebSite=0; 证监会与境外机构签署金融监管合作文件统计: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gjb/jghz/202011/t20201118\\_386443.html](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gjb/jghz/202011/t20201118_386443.html); 亚投行成员国: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 (WGI): <https://databank.shihang.org/WGI-Table/id/132a505b>; 中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 <http://treaty.mfa.gov.cn/web/advanceSearch.jsp>; 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统计; 联合国投票数据参见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LEJUQZ>; CEPII 数据库: <http://www.cepii.fr/CEPII/en/cepii/cepii.asp>; 孔子学院官网: <http://ci.cn/#/site/GlobalConfucius>; 文化产品贸易数据统计条目参考《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 (2015)》中的 268 种海关商品编码: 2015<http://zwgk.taizhou.gov.cn/module/download/downloadfile.jsp?classid=0&filename=7b7ddc0e237f44e28af06db62f7a6217.pdf>, 具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世界旅游组织年度入境旅游人数: <https://www.unwto.org/country-profile-inbound-tourism>; 中国领事服务网有关签证的数据来源: [http://cs.mfa.gov.cn/zggmccg/cgqz/qzxx\\_660462/t833978.shtml](http://cs.mfa.gov.cn/zggmccg/cgqz/qzxx_660462/t833978.shtml), [http://cs.mfa.gov.cn/zggmccg/cgqz/qzxx\\_660462/t1185357.shtml](http://cs.mfa.gov.cn/zggmccg/cgqz/qzxx_660462/t1185357.shtml); SATP 数据来源: <https://www.satp.org/south-asia-datasheet>; 武器价值单位为 TIV, 是 SIPRI 为了比较不同武器的交付数量和价值而开发的指标, 目的在于统一度量衡, SIPRI 数据: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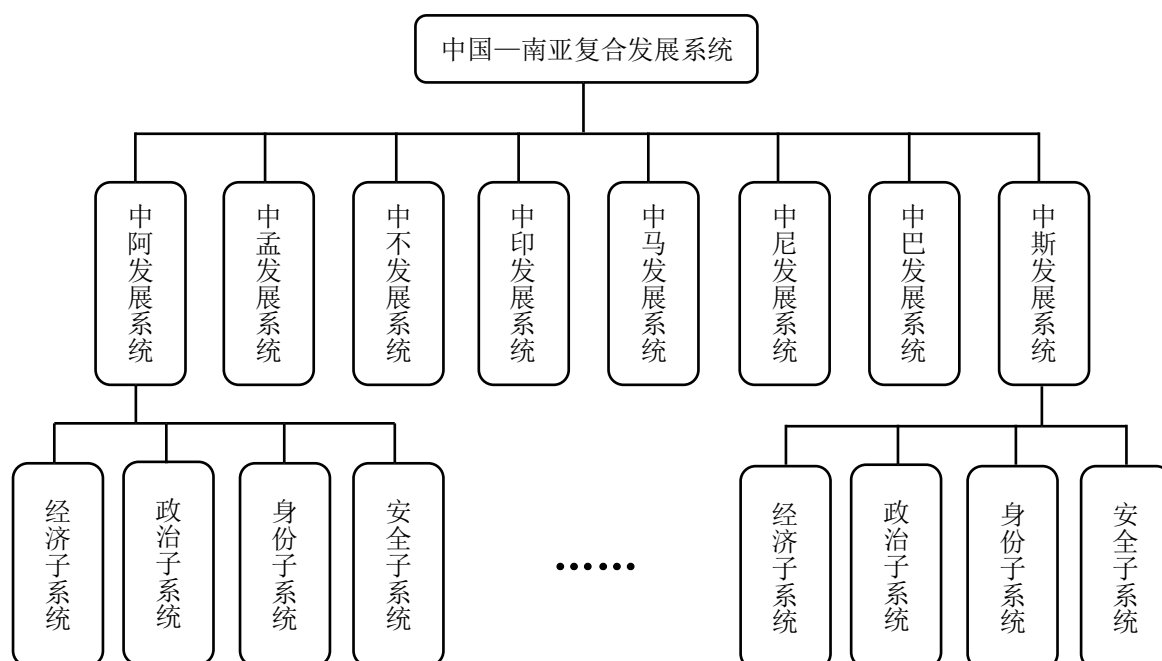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南亚协同发展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中国与其他国家构成的发展系统同样由经济、政治、身份、安全四个子系统构成, 故在图中用省略号进行表示。

对于经济子系统的评价主要基于双边的贸易往来、投资互动和金融合作三个层面展开。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sup>①</sup>双边的贸易往来对交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均有益处, 因此, 通过计算双边贸易总额 ( $e_{11}$ ) 来衡量双方的贸易往来,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有序程度。但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加快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光体现在贸易领域, 还体现在金融、投资和货币等领域的相互联系。<sup>②</sup>“一带一路”不光带动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 还拉动了与南亚诸国的投资需求和工程建设的需求, 例如,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和来自中国的工程建设的支持。基于此, 我们选取中国在对象国承包工程营业额 ( $e_{12}$ ) 和中国对外投资流量 ( $e_{13}$ ) 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合作。

<sup>①</sup>Tarlok Sing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Cause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The World Economy*, Vol. 33, No. 11, 2010, pp. 1517-1564.

<sup>②</sup>Erik Gartzke et al.,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2, 2001, pp. 391-438.

前者衡量了中国参与对象国的项目建设情况,后者作为流量指标,衡量的是当期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额中扣除反向投资额后的净额,<sup>①</sup>反映了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互动情况。金融领域的合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实现国家金融合作的基础,因此选取外汇储备规模( $e_{14}$ )作为衡量对象国金融环境的稳定性的替代指标,选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文件数( $e_{15}$ )度量金融监管的合作程度。同时,以双方在对象国的海外银行机构数( $e_{16}$ )、是否加入亚投行( $e_{17}$ )度量双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对于政治子系统,一国的政治环境会对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合作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不同会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对国家间的国际合作产生影响,<sup>②</sup>并且,政治环境的不同也会影响领导人作出承诺的可信度,从而对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合作产生影响。<sup>③</sup>由此可见,实现命运共同体政治子系统有序发展的关键是确保政治环境的稳定性,从而为政治互信和政治合作提供条件。我们对政治环境的衡量主要是基于政治稳定无暴力( $e_{21}$ )和政府治理效能( $e_{22}$ )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对政治互信的度量主要是基于高层互访( $e_{23}$ )、与中国属于同一国际组织的数量( $e_{24}$ )、双边使领馆总数( $e_{25}$ )、联合国投票的一致性( $e_{26}$ )四个维度。<sup>④</sup>高层互访反映了两国领导层联系的紧密度和政策沟通的频率,属于同一国际组织说明他国与中国的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双方互设使馆更是两国政治联系的体现,联合国投票的一致性则是衡量双方在议题表决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性。政治合作是双方政治互信结果的体现,政治合作的成果越多,证明双方政治互信的程度越大。因此,本文选取双边签署的文件数及条约数( $e_{27}$ )、是否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e_{28}$ )做为双方政治成果的度量指标。<sup>⑤</sup>

构建身份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加强双边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认知与认同,因而我们对身份子系统的度量也主要基于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已有研究指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地理位置是界定国家身份认同和角色划分的重要依据。<sup>⑥</sup>语言和宗教是反映一国文化特征的固定变量,也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因此,我们采用语言文字相似度( $e_{31}$ )和宗教信仰相似度( $e_{32}$ )两个指标衡量国家文化基因的相似程度。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能够影响两国政策沟通的效度,也能影响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度,<sup>⑦</sup>这种政策和文化上的双重联系也能作用于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因此采用地理位置的临近程度( $e_{33}$ )来刻画两国地理位置的远近。<sup>⑧</sup>虽然文化基因和地理区位是恒定不变的,但国与国之间身份认识度的提升仍然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社会交往来实现。文化交流有利于打破国家之间的文化边界,这不仅能够推动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还能有效降低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贸

①关于投资净额的释义参见:国家统计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度数据,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Michaela Mattes and Mariana Rodríguez, “Autocrac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 3, 2014, pp. 527-538.

③Brett Ashley Leeds,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3, 1999, pp.979-1002.

④联合国投票的一致性根据双方在联大投票的理想点距离进行度量,理想点距离的数值越大,表明双方在联大投票的分歧越大,因而该指标为负向指标。有关联合国投票理想点距离的计算参见 Michael A. Bailey et al.,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⑤采用赋值法,若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赋值为1,否则为0。

⑥张立、胡大一:《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当代亚太》,2021年第5期,第75~104页。

⑦同上。

⑧地理位置临近程度反映的是两国文化和社会交往的难易程度,因此采用CEPII数据库中双边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加权距离作为衡量地理位置临近程度的替代指标,数值越大,则距离越远,越不利于两国的文化和社会联系,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度也就越低,因此属于负向指标。

易,<sup>①</sup>本文选取对象国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数量( $e_{34}$ )来衡量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度。而文化产品贸易则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促进双方了解彼此文化内核,也能反映出双方的文化交流程度,因而用文化产品贸易总额( $e_{35}$ )进行度量。关于双方社会交流的衡量指标,囿于获取双边社会往来数据的限制,我们参照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做法,采取年度入境旅游人数( $e_{36}$ )、签证便利度( $e_{37}$ )两个国家维度的指标进行度量,<sup>②</sup>这两个指标度量了一国的开放程度和中国公民入境的便利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社会交往程度。

对安全子系统有序发展程度的衡量主要从安全环境和安全合作两个维度进行。与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类似,和谐稳定的地区环境是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基础,当一国深受地区安全的威胁亦或是存在安全困境,就会相应提升本国的军费开支以提高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sup>③</sup>但军费开支的提升从长期来看是不利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将经济领域的生产性资源向非生产性领域的资源过度转移,从而削弱国家生产创造的能力。<sup>④</sup>综合来看,军费开支是对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的一种观照,所处的安全环境越恶劣,则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基础越差,因此我们选取地区恐怖主义事件数量( $e_{41}$ )和军事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e_{42}$ )来直接和间接衡量地区的安全环境。对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度量主要基于合作成果,中国与南亚国家开展战略安全、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次数( $e_{43}$ ),以及南亚国家从中国进口武器价值( $e_{44}$ )都能直观衡量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成果。

虽然四个子系统由不同的指标体系构成,但四个子系统之间又存在相互联系。经济子系统的有序发展是其他子系统有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子系统的有序发展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合作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身份子系统的有序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身份认同度,从而促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协同合作,安全子系统的有序发展为经济发展、政策交流、文化和社会往来提供了安全保障。因此,子系统发展的有序度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度共同决定了中国与南亚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度。

### (三) 实证分析过程

首先是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四个子系统分别由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表征,指标单位并不统一,因而不能直接进行计算和比较。我们通过 *stata17.0* 采用标准差法计算不同指标的 Z—Score 值,进而得到各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其次,将得到的标准化值代入公式(1)计算子系统各个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指标有序度,将子系统的指标有序度代入公式(2)进行集成后得到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身份子系统、安全子系统的有序度值。随后将中国与  $i$  国发展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有序度值代入公式(3)即可得到中印、中巴、中斯等中国与南亚八国发展系统的内部协同度,从而验证中国与南亚各个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程度。最后,综合所有子系统的有序度值再次代入公式(3),验证中国—南亚复合系统的系统发展程度。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大量指标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并未将不丹和马尔代夫两国纳入中国—南亚复合系统中,也并未计算中国与这两国的协同发展程度。

---

<sup>①</sup>Qing Li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 Empirical Tes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Based o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areas."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Vol. 34, No. 1, 2021, pp. 1033-1059.

<sup>②</sup>为了衡量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一般采用双边数据进行度量,但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可以适当采用基于国家维度的数据进行表征,参见 Cyn-Young Park and Racquel Claveria, "Does Regional Integration Matter for Inclusiv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p. 2; 签证便利度采用赋值法,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赋值为 2,与中国有条件地互免签证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

<sup>③</sup>William Nordhaus et al.,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A Multi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3, 2012, pp. 491-513.

<sup>④</sup>Lloyd J. Dumas, "The Real Effects of Military Spending on Security."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 20, No. 3, 2014, pp. 377-393.



阿富汗的年度入境旅游人数 ( $e_{36}$ ) 和地区恐怖主义事件数量 ( $e_{41}$ ) 两个指标数据也存在大量缺失, 因而也未纳入复合系统中, 但对于缺失数据, 我们采用删除法后仍可计算中阿发展系统的协同程度。其他国家也存在少量的数据损失, 我们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采用线性插值法或临近值替代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全。<sup>①</sup>在进行标准化计算时, 由于指标中存在虚拟变量和其他数据为 0 的情况, 为了规避分母为 0 而失去计算意义, 将 0 用 0.000001 替代处理。<sup>②</sup>

本文研究的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程度, 因而不光需要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南亚的协同发展程度, 还需设置对照组, 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南亚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对比, 从而更能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对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贡献度。我们选取 2006—2019 年的数据进行计算, 201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元年, 因此以 2013 年为基年, 将 2014-2019 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协同发展度设为实验组; 相应的, 以 2006 年作为基年, 将 2007—2012 年的协同发展度设为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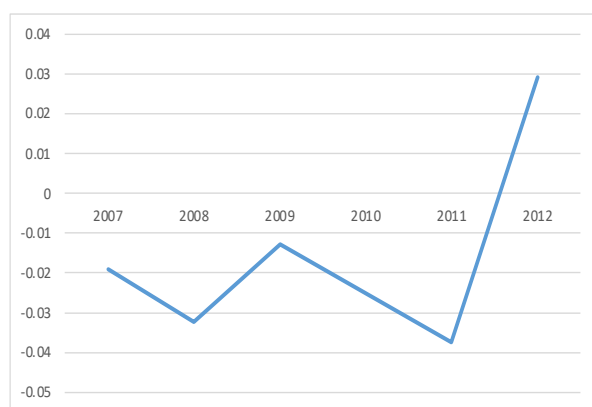


图 3 中印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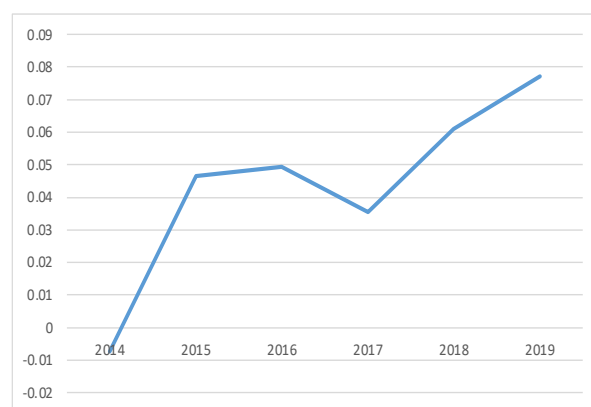


图 4 中印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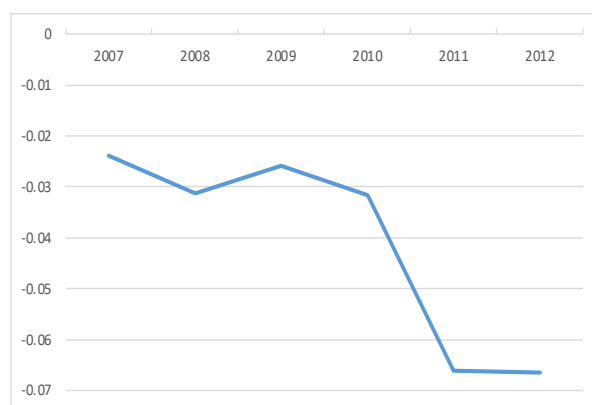


图 5 中巴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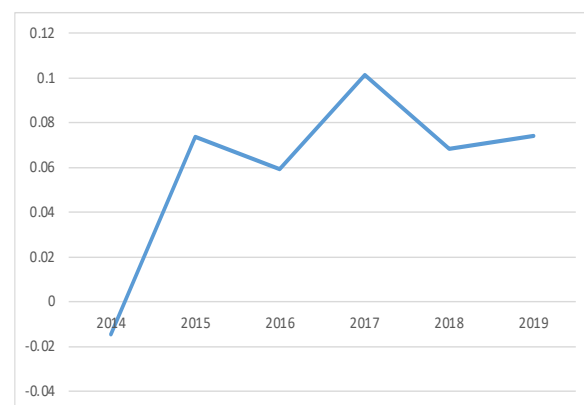


图 6 中巴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sup>①</sup> Cyn-Young Park and Racquel Claveria, “Does Regional Integration Matter for Inclusiv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p. 51; 邓建新等:《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统计与决策》,2019年第23期,第28~34页。

<sup>②</sup> 黄鹏等:《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 AHP 法和熵值法动态评价比较》,《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338页。

<sup>③</sup> 以 2006 和 2013 作为基年的意思是,以这两年作为参照的逻辑起点,衡量后续年份与基年的这一时间段内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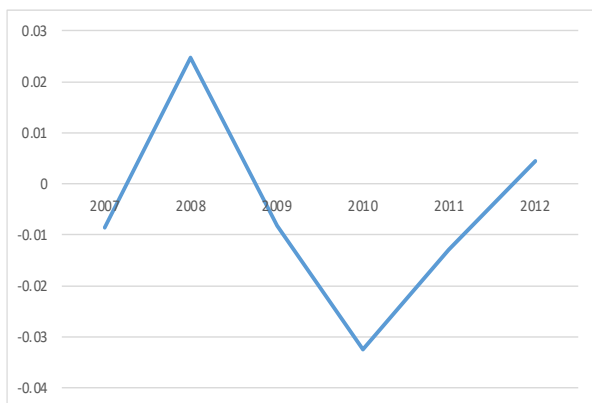


图 7 中孟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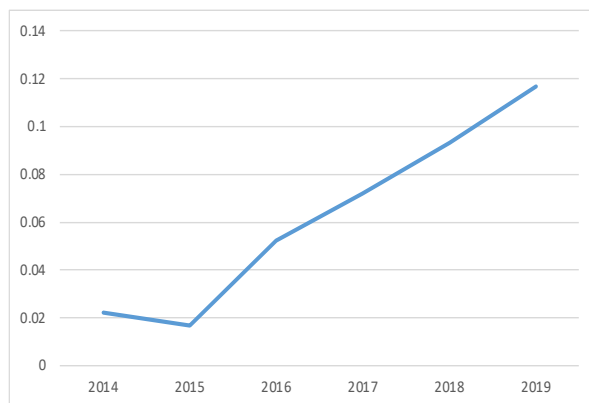


图 8 中孟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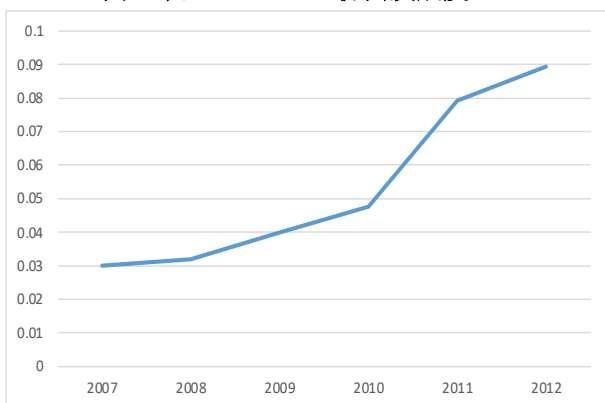


图 9 中尼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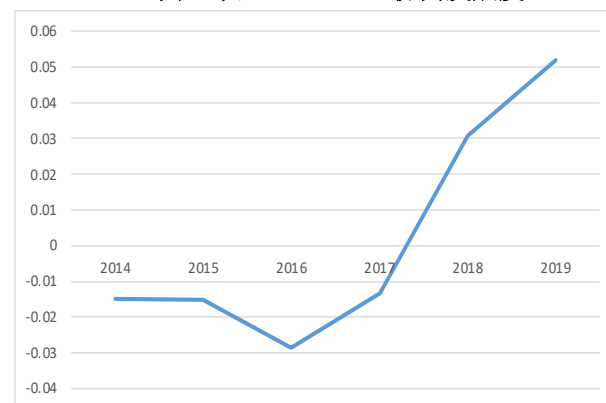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尼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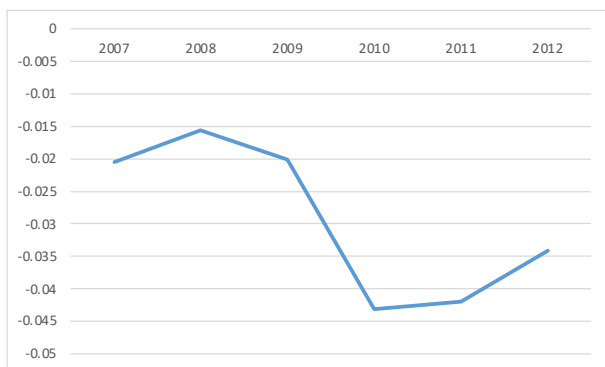


图 11 中斯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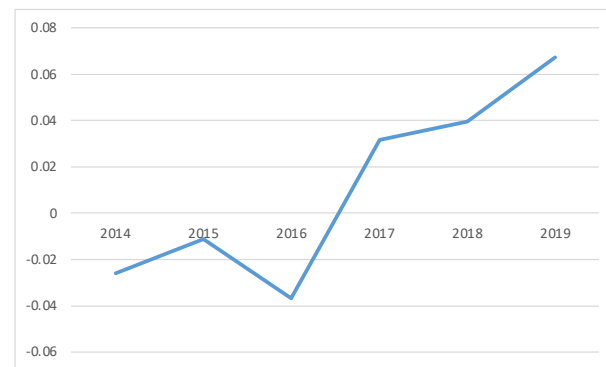


图 12 中斯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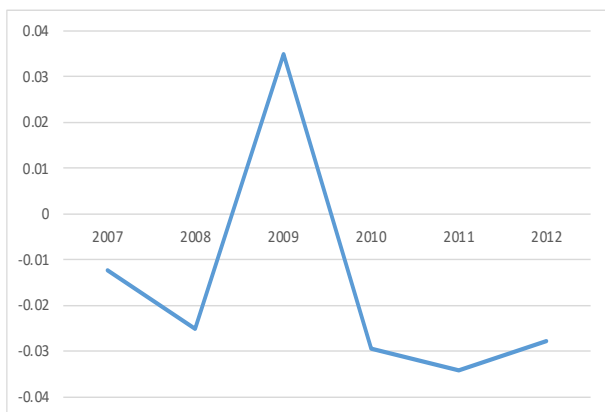


图 13 中阿 2007-2012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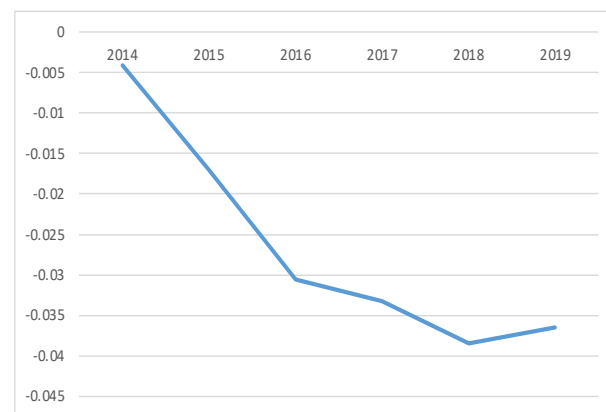


图 14 中阿 2014-2019 协同发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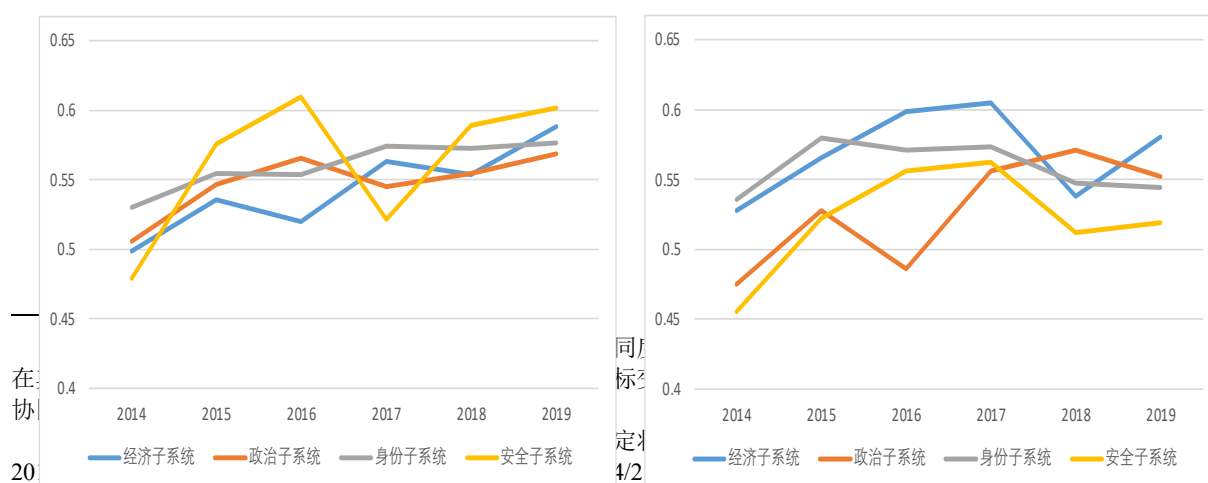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3 至图 14 分别刻画了 2007—2012 年和 2014—2019 年两阶段，中印、中巴、中孟、中尼、中斯、中阿发展系统的内部协同度。基于对比可以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协同发展程度基本处于负值，这意味着中国与上述国家在经济、政治、身份和安全四个维度并不存在协同发展效应。中国与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协同发展度处于正负波动状态，也就是说中国与两国在某一年处于协同发展状态，但在另一年又处于无序状态。唯有中国与尼泊尔在 2007-2012 年始终处于协同发展状态，证明中国与尼泊尔在四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紧密并相互影响。

2014—2019 年的协同发展度衡量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发展状况。令人兴奋的是，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与南亚五国（阿富汗除外）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协同度的值表现出由负到正的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带一路”对实现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sup>①</sup>协同度为正意味着中国和南亚五国在经济、政治、身份和安全四个维度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协同效应。阿富汗则由于地区的复杂性，与中国并不存在协同发展效应，中国与阿富汗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程度较弱。

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中国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协同发展状况，根据图 4 和图 6 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2014 年至 2019 年中国同巴基斯坦协同发展程度的平均值为 0.06，这一数据显著高于中国同印度协同度的平均值 0.04，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各个维度的依赖与协同明显高于印度，这也符合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sup>②</sup>

图 15 和图 16 记录了中印、中巴子系统的有序度，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协同度变化的内在机理。从图 15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在经济、政治和身份维度的有序程度基本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唯有安全子系统的有序度起伏波动较大，尤其在 2017 年处于低谷，究其原因在于 2017 年中印在边境地区存在军事对峙，<sup>③</sup>这使得 2017 年中印两国在安全维度的有序度下降。但随后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先后在武汉和金奈举行会晤，<sup>④</sup>两国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也随之回暖，这也体现在了政治和安全子系统有序度的上升。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协同发展程度以及子系统有序度虽然伴随小幅度的波动，但总体表现为平稳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中巴关系稳中有进，并且两国发展联系紧密。



③吴黎明：《新华国际时评：给印度三点“忠告”》，新华网，2017年8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8/03/c\\_1121427634.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8/03/c_1121427634.htm)。

④《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央视网，2018年4月27日，<http://news.cctv.com/2018/04/27/ARTIZ34ze9apBbJbMtbj7f4C180427.shtml>；《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网，2019年10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12/c\\_1125093788.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12/c_1125093788.htm)。

图 15 中印子系统有序度

图 16 中巴子系统有序度

最后，本文计算了根据各个子系统的有序度值差，计算出了中国—南亚复合系统的协同度，进而衡量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程度。根据图 17 的结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14-2017 年，中国与南亚整体的协同发展程度为负，双方的发展是无序的，但在 2018 年，协同度由负转正，并且上升趋势明显，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的协同效应初显。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协同度和中国—南亚整体的协同发展度趋势基本一致，并且中巴两国的协同发展程度领跑南亚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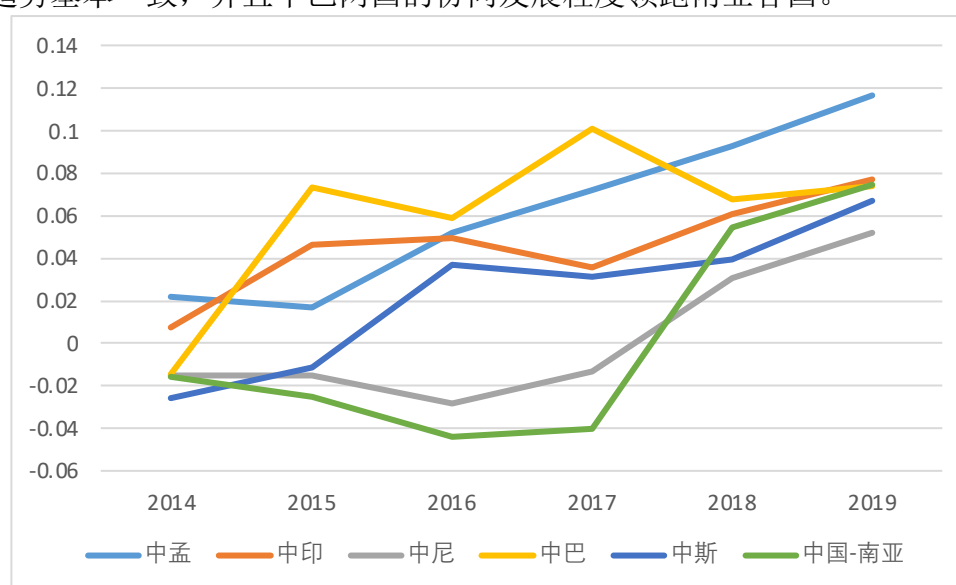


图 17 中国—南亚复合系统协同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种影响虽然在前期表现的并不明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化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协同发展效应得以逐步显现。中国的发展带动着南亚的发展，南亚的进步又促进了中国，中国与南亚山水相依、命运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正在中国与南亚区域间实践中逐步得到展现。仍需关注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涵盖所有国家的发展理念，但南亚依然存在着与地区发展严重脱节的国家，例如阿富汗，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应给予这些国家更多关注，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照耀到阳光下的每一个角落。

## 五、 结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外交理念，“一带一路”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方案与路径，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相连。本文借鉴协同学思想，在协同发展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下理解中国与南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本文认为协同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的需要、是缩小“南北差距”和深化“南北合

作”的需要、是大国与小国协同合作的需要、也是全球国家共抗风险的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在于加深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加强政治领域的互动以实现政策沟通和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以提高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度，加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

本文对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协同发展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命运相连，但仍然存在个别国家发展脱钩的现象，需要各国齐心协同，共同践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地区环境日渐复杂状况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此时更应加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化合作，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营造协同共进的环境，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outh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y Zhang Li & Hu Dayi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diplomat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China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no great change in a hundred year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scheme and path to realize this concept, and through interconnection, the fat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an be realiz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China and South Asia by using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 and to measure its actual progress with the relevant data. This paper holds that whether countries maintai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to measure whethe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with a destiny has been effectively reflected in practi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on the degree of synergy of China-South Asia composite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nomic community, political community,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ecurity commun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outh Asia Community with a Destiny since the proposal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except for the low resonance effect between China and Afghanistan and other individual countries,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effec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has begun to appear. The degree of synerg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trend of China-South Asia as a whole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leads South Asian countries. This shows tha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romoted the fate of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sudden shocks such as COVID-19's epidemic situation are inevitable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al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deepen cooperation, tak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destiny as a guide, reduce unnecessary internal consumption, and create a coordinated policy atmosphere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South Asia;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Degree of synergy